

十七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



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從事現代化。中國領導層明白中國與先進發達國家的差距，故在這改革開放時期，樂意與各國合作創造雙贏的局面。這是胡錦濤等中國領導人強調「和平與發展」與「和諧世界」的基本原因。強調和平與和諧有其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的一面；但為了爭取早日實現現代化，中國顯然希望避免衝突，特別是與大國的衝突。

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中國愈來愈融入國際社會。和平崛起也意味着和平競爭，在現存的國際規章制度底下從事競爭，雖然中國就這些規章制度的建構並未享有發言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雖然中國被拒享有發展中國家的優惠，而在可見的將來，中國要大幅改變世貿的規章也殊不容易，但是中國仍然積極爭取加入。中國領導層的考慮是：不打開國門從事競爭，中國就無法追上國際最先進的水平，中國就永遠處於落後的狀態。於是中國毅然擁抱全球化，接受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帶來的種種挑戰。

同樣，中國選擇參與各類國際軍控與安全對話機制，接受這種參與所涵蓋的限制，目的是為了建立互信、減少國際間的緊張和安全風險，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近年中國正努力建立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2007年10月中共舉行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胡錦濤的報告就外交環節以「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為標題。胡錦濤宣稱：「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國與國相互依存日益緊密，國際力量對比朝着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國際形勢總體穩定。」^①但是在這種自信的背後，中國的領導層與知識份子群有其擔心與不滿。這種情緒明顯反映於針對西方國家在2008年3月西藏騷亂後對北京奧運的杯葛所引起的憤怒。自1980年代末開始，在「六四事件」、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中國各類制裁引發兩個問題：西方國家是否真的想「圍堵」中國？西方國家為甚麼不能接受中國的崛起？杯葛北京奧運的行為使這兩個問題重新浮現。

根據建構主義的邏輯，中國的和平崛起要求配套的價值觀與概念。首先，中國接受現存國際組織的框架。自1970年代末開始，中國對國際組織的參與漸

中國領導層的考慮是：不打開國門從事競爭，中國就無法追上國際最先進的水平，中國就永遠處於落後的狀態。於是中國毅然擁抱全球化，接受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帶來的種種挑戰。

趨積極，外援的增加與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有力支持都是明顯的例子。近年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中國在各個國際組織中要求享有大國的地位與影響力。中國的行為模式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低調地運用其經濟影響力。

雖然國際社會不一定相信中國和平崛起的意圖，但中國接受現狀而無意挑戰現存的國際體制與秩序漸漸贏得各國的信任。中國經濟發展的成績足以說服國際社會中國認同目前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國不斷提升的國際地位亦消弭了中國挑戰現階段的國際政治秩序的誘因。

中國領導層明白拒絕接受西方的民主模式是美國在本世紀初拉攏俄羅斯，以及自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總統時期開始爭取印度支持以制衡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故此近年胡錦濤和溫家寶訪問西方國家時，往往特意表達中國走向民主、法治的承諾。

中國努力消除「中國威脅論」，尤其是鄰近國家針對中國的疑慮^②。正因為其他國家擔心中國的經濟力量會轉化為軍事力量，中國強調「和平與發展」；正因為中國要追上先進發達國家水平起碼需時數十年，中國維持和平國際環境的立場是長期的戰略目標。

具體而言，中國要與所有大國，特別是美國，維持友好關係；對周邊國家要採取「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方針；避免戰爭與軍事衝突。謀求地區霸權將會產生反效果——這很可能會導致與美國的衝突以及鄰國的反對。地區霸權無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反而會削弱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

近年中國領導人正研究自十五世紀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崛起的經驗，以求避免它們的錯誤^③。本世紀初，國內學術界廣泛討論一種論點，就是根據歷史經驗，不少國家發展水平達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1,000美元以後，往往出現政治動蕩、社會矛盾激化、民族間關係緊張等問題，以致發展停滯不前。南美洲巴西、阿根廷等大國就是前車之鑒。相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發展水平達到人均GDP1,000美元以後，仍然能夠好好利用這個基礎繼續發展。

另一方面，國內不少智囊機構針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原因作了不少研究，為領導層提供參考。雖然這些研究並未在國內主流媒體引起廣泛討論，但相信對中共維持黨對政治權力壟斷的各類措施有重要的影響。簡言之，在尋求大國地位之路，中國領導層愈來愈重視國內發展的作用。

一 胡、溫之前的外交政策路線

自1982至1983年開始，中國領導層逐漸放棄1970年代中期所強調的「三個世界理論」，轉而重視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鄧小平宣稱世界大戰可以推遲；而中國領導層了解到中共政權的認受性要建基於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績之上。

「六四事件」後，鄧小平就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外交政策在領導層內部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表述，如「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等指引為研究中國外交的國內學

雖然國際社會不一定相信中國和平崛起的意圖，但中國接受現狀而無意挑戰現存的國際體制與秩序漸漸贏得各國的信任。中國經濟發展的成績足以說服國際社會中國認同目前的國際經濟秩序。

者廣泛引述。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在面對內部困難和國際壓力時並未訴諸激進和孤立的外交政策，是值得讚揚的。他們仍要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以集中精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並認為未來數十年的國際競爭將以「綜合國力」為基礎，經濟和技術佔重要的地位，而中國已失去了大量寶貴的時間。

從1990年代初開始，中國逐漸傾向接受多邊外交以及在區域性國際組織中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在推動世界多極化的同時，中國領導層顯然認為中國亦是其中一極。

在江澤民時期，中國繼續宣稱世界局勢仍然朝着多極化的方向發展。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上經濟增長取得驕人的成就，中國自然積極爭取大國的地位和影響力，成為多極世界的一極。純粹從數據觀察，起碼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海嘯之前，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優勢，應該是不斷擴大。不過，中國領導層的着眼點是長期的趨勢以及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強勢迫使中國現階段要努力維持良好的中美關係。

中國領導層一直在發展相關的戰略思想，以支持中國在本世紀崛起成為大國。他們不單重視「硬件」如經濟、軍事力量，更着重國際戰略、價值觀等「軟件」④。中國學者認為正確的國際戰略是大國興衰的一項基本因素。

與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重建國際秩序不同，目前中國可說是在現代史上首次有機會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的建構。作為後冷戰時期受到廣泛承認的大國，中國領導層認為中國可以作出有建設性的貢獻。冷戰期間，中國是美蘇兩大陣營以外最強大的國家，但當時中國只能阻撓美蘇對中國不利的圖謀，不能嘗試實現本身的宏圖。

中國的外交政策框架不斷演進，回應所遭遇到的機會和挫折；有時在執行上亦難免出現混亂，形成框架的不規範。戰略夥伴關係的概念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其實是俄方首先提出的⑤；中美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亦是克林頓總統1996年11月訪問澳洲時首先建議的⑥。江澤民迅速接納對方的倡議，而中國亦開始與各個大國建立種種的夥伴關係。初期這些夥伴關係隱然有一種層次，從戰略夥伴關係、睦鄰互信的長期夥伴關係，以至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等。但後來與中國建立夥伴關係的國家愈來愈多，夥伴關係又經常升級，以致原先的層次不再清晰。目前中國與委內瑞拉、西班牙等國也有戰略夥伴關係。

1997年3月，中國領導人在東盟地區論壇有關建立信心措施的會議上提出「新安全觀」的概念，建基於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希望構建共同安全及共同利益，促進合作，避免對抗⑦。「新安全觀」有濃厚的建構主義元素，中國領導人試圖說服國際社會接受以合作為基礎的安全價值觀，符合現代的國際合作理論。

稍後在2000年9月聯合國的元首峰會，江澤民表示不管是維護世界和平，抑或是推動共同發展，中國均會在國際事務上落實民主原則。同年10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部長會議上，江澤民重申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中國的立場是：西方國家宣揚民主制度的優越性，自然應該在國際事務上遵循民主原則，摒棄權力政治及單邊主義。民主要求尊重多元化；中國要求西方國家尊重不同的政治制度，放棄強制其他國家接受西方的民主政制。

中國的立場是：西方國家宣揚民主制度的優越性，自然應該在國際事務上遵循民主原則，摒棄權力政治及單邊主義。民主要求尊重多元化；中國要求西方國家尊重不同的政治制度，放棄強制其他國家接受西方的民主政制。

二 胡、溫外交政策路線的主要概念

與其他國家領袖相比較，中國領導人更重視理論創新以鞏固中共政權的認受性與其本身的歷史地位。胡、溫的外交路線繼續在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理念和江澤民的「新安全觀」以及「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原則等基礎上發展。

2003年年底，胡、溫開始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12月26日紀念毛澤東110周年冥誕時，胡錦濤宣稱中國會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兩周前溫家寶訪美在哈佛大學演講時亦趁此機會向國際社會闡釋中國「和平崛起」之路。翌年「和平崛起」雖然修訂為「和平發展」，但外界的評論依然針對原先「和平崛起」的概念。國內學者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焦點在於中國處身於國際體系和國際市場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中國的適應能力、整合能力、影響力和創新能力。中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藉此成為世界大國。

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作出重大貢獻：首先是中國十三億人口的生活水平穩步上升；其次是中國成為推動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對全球經濟發展亦作出積極貢獻；再次是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有助全球達致最優的資源調配；最後是中國希望在國際經濟機制中扮演一個有建設性的角色，充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橋樑。

不過，中國經濟的急速發展也造成與外部經濟的摩擦，包括人民幣的匯率、鉅額的外貿盈餘、製造業大規模轉移到中國、國際性通縮等。最近的國際金融海嘯更突顯這類問題：美國的「雙赤」和東亞地區包括中國的大量外貿盈餘被視為國際金融體系失衡的一個主因。中國領導人了解，長遠而言，中國可持續的經濟成長必須減少對外貿的依賴，轉而依靠內需；同時，中國的資金亦要「走出去」。不過，在當前的經濟困難中，中國必須減少失業率以維持社會穩定，故此不容人民幣在近期升值；而刺激經濟的投資亦會加劇產能過剩的問題。

中國領導人致力消弭「中國威脅論」，中國崛起自然為當前的大國視為威脅與挑戰；中國擔心這種反應會導致其他大國「圍堵」中國。事實上，中國領導層與知識份子普遍認為美國正在「圍堵」中國，而這正是中美種種摩擦的根源。中國有關學者嘗試解釋中國的「和平崛起」包涵重新界定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安全，而這主要反映於中國的「新安全觀」；中國領導人亦經常強調中國與鄰國以至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新安全觀」涵蓋非傳統安全和人類安全；這也是中國與其他大國合作的基礎。中國領導人期望建立國際關係的新框架，不過現階段能贏得的支持有限。構建這新框架的目的在開拓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空間，爭取二十至五十年的時間發展經濟，追上世界最先進的國家。為此，中國願意忍讓，尤其是處理中美、中日關係，以致領導人為國內知識份子批評為軟弱。近年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在小泉純一郎任首相期間，中國政府對日政策不得不採取強硬的立場。

2003年5月，胡錦濤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闡釋中國的「新安全觀」，強調加強互信，在平等基礎上協商，尋求廣泛的合作以達致普世與持久的安全。胡錦濤表示軍事措施可能贏得短暫的勝利，但不會帶來持久的安全。

中國領導人致力消弭「中國威脅論」，中國崛起自然為當前的大國視為威脅與挑戰；中國擔心這種反應會導致其他大國「圍堵」中國。事實上，中國領導層與知識份子普遍認為美國正在「圍堵」中國，而這正是中美種種摩擦的根源。

中國的主張可說是後起者爭取時間扭轉弱勢的戰略。中國領導人經常宣揚以對話解決分歧。作為對美國單邊主義和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文明衝突論」^①的間接批評，中國的宣傳機器宣揚不同文明、社會制度發展模式之間的相互尊重、交流與學習以及和平競爭。在推動世界多極化的同時，中國亦鼓吹國際關係民主化、加強聯合國的角色和尊重各國不同的發展道路。

中國努力突顯其崛起有異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中國加入世貿大概是中國擁抱全球化最重要的決定。全球化下生產要素的高度流通為中國提供戰略機遇，中國利用其廉價勞動力採取出口主導的發展戰略，成為「世界工廠」和「吸納外資的黑洞」。

對眾多依賴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是強勁的競爭對手。不過中國學者指出國際分工 (包括產業內的國際分工) 取決於跨國企業；中國努力爬升附高值的階梯發展技術密集型的工業。中國企業亦致力建立其品牌和國際營銷網絡；不然，中國盈利的份額仍將嚴重的偏低。中國的解釋符合事實；中國認同為第三世界的一份子並願意與發展中國家攜手爭回一定程度的自主。

中國領導人明白，在亞洲鄰國眼中，中國成功吸引大量外資有損它們的利益。中國承認外資對其現代化的貢獻；不過現階段中國更需要高科技、先進管理與國際市場。中國必須平衡吸引外資與外商搶佔中國市場；各省份不惜代價相互競逐外資亦造成不少損失。近年中國開始增加對外投資，鞏固能源、原材料的供應和開拓海外市場。金融海嘯後，中國坐擁二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享有國際併購的黃金機會，控制能源、原材料供應的大企業是中國的主要目標。

地區整合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中國外交的重點是亞太地區，與東盟的合作和「東盟10+3」的框架自是中國重視的地區整合。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及中國—歐盟的合作則是推動多極化的重心。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地區整合也得到中國的支持，因為這會增強它們的討價還價能力，而且有助促進世界多極化。在2003年9月墨西哥的世貿部長級會議，中國在二十國集團 (G20) 中扮演相當積極的角色，大力支持巴西、印度和南非爭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就縮窄南北差距和促進南南合作，中國領導人近年愈來愈積極；金融海嘯以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更是舉足輕重。

作為對美國單邊主義和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間接批評，中國宣揚不同文明、社會制度發展模式之間的相互尊重、交流與學習以及和平競爭；中國亦鼓吹國際關係民主化、加強聯合國的角色和尊重各國不同的發展道路。

三 胡、溫的「和諧世界觀」

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後一年左右提出「和平崛起」的論述。2005年4月，胡錦濤在亞非高峰會議中倡議亞非國家應倡導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平等對話，共同建設和諧世界。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向國際社會提出「和諧世界」的理念。同年9月，胡錦濤出席慶祝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的元首峰會，發表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演講，詳細說明中國領導層的「和諧世界觀」。當時胡錦濤的地位已經穩固，中國官方媒體將「和諧世界」標榜為「中國外交新主張」和「中國外交思想的新發展」。翌年8月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和諧世界」更被界定為外事工作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和外事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

胡錦濤在上述聯合國的演講中，闡釋「和諧世界觀」的三項重要內容。首先是共同安全：要堅持多邊主義，摒棄冷戰思維，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內容的新安全觀，通過協商、談判解決國際爭端；其次是共同繁榮：建立開放公平的多邊貿易體制，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轉讓技術、增加援助、減免債務；最後是和諧世界：堅持包容精神，加強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

「和諧世界觀」是目前中國領導層新國際秩序的藍圖。它包含了以前鄧小平和江澤民的理論貢獻；這藍圖亦已相當完整，反映中共第四代領導人信心的增強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內政外交的聯繫非常清晰：「和諧世界觀」顯然是「和諧社會」理念的延伸，而後者是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時胡錦濤提出的。

「和諧世界觀」是目前中國領導層新國際秩序的藍圖。它包含了以前鄧小平和江澤民的理論貢獻；這藍圖亦已相當完整，反映中共第四代領導人信心的增強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

四 多邊主義、軟實力和經濟安全

冷戰結束後，中國領導人逐漸接受多邊主義和地區主義已成為大勢所趨。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清楚接受現存的國際體系，並嘗試尋求各類國際組織支持中國的發展。

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其多邊外交活動亦更形活躍。聯合國的維和行動是重要的例子。1989年前，中國拒絕參與；1990年，中國首次派遣五名軍事觀察員參加中東地區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的維和行動。2008年4月，胡錦濤在博鰲亞洲論壇表示中國共參與二十二次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參與人數達一萬人次以上。胡錦濤當政五年多以來，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比以前十二年超過差不多七倍。

中國在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的角色反映中國在地區問題上的影響力。江澤民時期中國未見積極調解區域性危機，例如1999年印巴之間的核武危機，中國就未見參與調停。至2002年年底北韓的核武計劃引發與美國對抗，中國出面先安排雙方談判，繼而推動六方會談。後者雖然波折重重，但中國顯示其負責任大國的態度，亦贏得美國的信任。

早前江澤民婉拒參與八國集團(G8)；胡錦濤當政後則開始參加八國集團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對話會。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於2010年成立自由貿易區，先涵蓋原先東盟六國，五年後再包括其餘四國。

2003年，中國成為首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區外大國。東亞峰會成為定期的機制自然符合中國的利益，雖然澳洲、新西蘭和印度的加入反映美、日和一些東盟國家對中國存有戒心。中國與東盟的關係是中國多邊外交和與地區組織交往的成功範例。中國與東盟、印尼和越南已經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儘管中美、中日關係仍有各種摩擦，但東盟充分尊重中國的基本利益，加強經濟合作，繼續重視與中國的良好關係。

上海合作組織可說是中國的創意。1990年代初，蘇聯崩潰，中國領導人迅速與中亞五國建立睦鄰友好關係，避免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問題惡化。2001年6月，在中國與俄羅斯和中亞諸國改善關係的基礎上，中、俄、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建立上海合作組織。隨後，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均加入為觀察員。雖然貿易和投資還有待繼續發展，但上海合作組織有很強的機構框架，包括元首理事會、政府首腦理事會等，而有關反恐的軍事合作亦是組織發展的重點。

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美軍開始在中亞部署。但中亞國家領導層對西方國家散播民主思想感到不滿，對「顏色革命」有很大的戒心。中、俄兩國遂有機會利用這種反美情緒限制美國的影響力。壓制美國的勢力亦有助中國在中亞地區與美國競逐石油資源。2005年5月，烏茲別克斯坦政府鎮壓國內東部的暴亂，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要求獨立調查。烏國總統卡里莫夫 (Islam A. Karimov) 訪問北京，贏得中國政府的支持，並與中國簽訂一項六億美元共同開發烏國油、氣的合約。

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國與中亞以及俄羅斯推動發展共同利益的重要機制。它有助維持中國西北邊疆的穩定，打擊敵對勢力。近年彼此的貿易和投資均有所提升；「歐亞大陸橋」相信有可觀的發展潛力。不過支持獨裁的政權總有風險，中亞地區的民主化可能會削弱中國的影響力。

今天中國的領導人充分掌握如何利用國際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 (NGO) 作為全球化的平台推動多邊合作，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完成中國現代化的大業。中國參加了一百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 (2006年底陳馮富珍當選世界衛生組織 [WHO] 總幹事是其中一個例子)，簽署了三百多份國際公約，在世界各國中位列二十七。就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中國位列三十一。在亞洲地區，就制訂議程、影響組織發展方面，中國的影響力近年有顯著的增長。小布殊 (George W. Bush) 政府的單邊主義和專橫作風間接對中國有利。

中國沒有鼓吹「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 ⑩與「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⑪競爭，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自然增加其發展模式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金融海嘯更進一步打擊「華盛頓共識」的聲望，而為中國提供機會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爭取發展中國家利益。

江澤民與胡錦濤自本世紀初均致力建設「第二軌道」的國際平台。2001年，中國成立博鰲亞洲論壇，旨在加強亞洲區內與其他地區企業和政府間的交流。翌年10月，韓國高等教育財團事務總長金在烈訪問北京大學後，雙方於2004年8月召開主題為「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的首屆「北京論壇」；稍後在2005年5月，上海復旦大學召開首屆「上海論壇」，來自全球的專家學者、企業家和政界人士就「經濟全球化與亞洲的選擇」的主題討論如何應對全球化的各種挑戰。中國各大城市主辦各類國際論壇近年已成為趨勢。

中國文化與漢語亦成為中國強化其軟實力的重要內涵⑫。2004年，中國通過合作方式，開始在全球開辦孔子學院，向全世界推廣「具有和平特質的中華文化」。根據計劃，至2010年，海外大概會有五百所孔子學院。這些孔子學院提供五類服務：開展漢語教學；培訓漢語教師；開展漢語考試和漢語教師資格認證；提供中國教育文化信息諮詢；以及開展中外語言文化交流。採用「孔子學院」的名稱，大概是要避免官方宣傳的形象和利用傳統中國文化的吸引力。

過去三十年，中國以和平的手段取得資金、技術資源和市場支持其經濟發展。中國領導人了解中國與世界的深度相互依存，故此國際合作是中國現代化和提升其綜合國力的最佳選擇，擁抱全球化是中國追上最先進國家的必由之路。

過去三十年，中國以和平的手段取得資金、技術資源和市場支持其經濟發展。中國領導人了解中國與世界的深度相互依存，故此國際合作是中國現代化和提升其綜合國力的最佳選擇，擁抱全球化是中國追上最先進國家的必由之路。

雖然中國領導層明白中國必須減少對外貿的依賴，但在可見的將來，其外貿佔GDP的比重仍會上升。中國與非洲、拉美、中東地區的交往有很強的「資源外交」成份，與1970年代日本的「石油外交」有點相似。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希望能直接購進油氣田，寧願多付也不願意依賴由西方石油企業控制的國際石油市場。中國的「資源外交」很容易產生與西方國家的戰略與經濟摩擦。

中國與非洲、拉美、中東等地區的交往雖然要克服交通運輸和語言溝通上的困難，但彼此沒有戰略和政治上的分歧。它們共同的第三世界立場反映於聯合國投票時高度的一致性。鑒於中國就發展中國家問題的表態日趨積極，彼此的外交協作會更緊密，雖然這並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重點。

根據國內專家的分析，中國在非洲和拉美的經濟利益建基於若干前題。一是北京相信上述地區的宏觀經濟於世紀之交已扭轉頹勢，穩步向前；二是中國的出口結構優勢在價廉而不是品質精美，適合這些地區的市場；最後自然是它們擁有中國所需的資源。中國政府大力支持國企尋找貨源供應，中國的外貿盈餘、外匯儲備和外援政策均支持中國大舉向外投資。

中國目前向160多個亞、非、東歐、拉美和南太平洋國家提供捐贈、免息和低息貸款。2006年，中國的外援超越82億元人民幣。翌年年底，中國共免除不發達國家347項貸款。大概10萬名外國官員、經理及技術人才到中國接受培訓和教育。從2005年開始，中國派遣青年志願工作者到發展中國家服務^⑩。在可見的將來，中國外援的規模將有可觀的增長。

然而，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投資有時會招致當地人士的反感。中國在非洲投資的紡織、煤礦、銅礦等企業，被投訴工資偏低和工作安全條件差。在贊比亞等國，當地政府阻止中資紡織廠的經理夜間把工人鎖在廠內；亦有因為在礦坑工作的工人缺乏安全的衣服和鞋靴而要求煤礦企業停工。當地中資企業工人抗議事件時有所聞。中國企業在非洲等地承包基建工程的業務相當成功。不過，與西方企業不同，中資企業經常引進數以萬計的中國勞工。在當地失業問題嚴峻的環境底下，自然容易惹來批評。中國廉價消費品的傾銷對當地就業市場造成打擊；中國移民的湧入亦佔據了當地的零售市場。

在東南亞老撾、柬埔寨等國，中國企業土地開發、水利等投資項目有時有違環保的原則，招致國際環保組織如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批評。收地自然容易引發當地居民的抗拒；貪污行賄與當地官員勾結亦是常見的問題。

總體而言，中國的進口與投資增強了第三世界國家與西方國家的討價能力；中國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推高了它們的價格，對生產國亦屬有利。理論上中國可以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適用的各種技術；中國現階段所掌握的工業生產技術事實上對幫助發展中國家推動工業化和工業升級應該大有裨益，但這方面中國尚未有明顯的貢獻^⑪。

教育和人力資源發展是開拓中國軟實力的有效途徑。為第三世界學生提供獎學金到中國留學、為它們培訓人才、派遣教師到發展中國家服務等計劃近年有大幅擴展。在2003年，一半的非洲留學生在中國攻讀研究生學位。栽培非洲的精英可望改善中國在當地的形象，亦期望能加強兩地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合作。為此，中國的校園和社會必須盡力避免歧視非洲人。

中國與非洲、拉美、中東地區的交往有很強的「資源外交」成份，與1970年代日本的「石油外交」有點相似。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希望能直接購進油氣田，寧願多付也不願意依賴由西方石油企業控制的國際石油市場。

為消弭第三世界國家居民的反感，中國的對外投資要更有創意。中國當局可以考慮利用外援的資金協助中資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成為「模範外資企業」，讓它們善待當地僱員，為當地的社區發展作出貢獻。這要求外交部、商業部和大中型國企建立協調機制。隨着中國對外投資迅速增加，這種協調更形重要。

2009年3月人大會議期間，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篪在記者招待會中表示，中國外交政策的一項主線，就是保證中國平穩而較快速的經濟發展。事實上，一些學者較早前已把中國外交界定為「現代化外交」。

五 結論

甘乃迪 (Paul Kennedy) 的《大國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在國內廣泛流傳。他認為中國是列強中最窮和戰略位置最差者；他亦認為中國的崛起有賴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有遠見的戰略^④。前者國內共識甚為清晰；後者的努力可見諸中央電視台十二集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中國領導層和知識份子均以史為鑒，探求中國崛起的大戰略。

過去中國領導人以其世界觀和當代全球矛盾的分析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現時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大概已發展出一套較為完整的、以「和諧世界觀」為基礎的外交理論框架。「和諧世界觀」包涵「新安全觀」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兩大重要概念。現階段中國領導人自言繼續努力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致力中國的現代化，因而中國必須避免與美國和其他大國的衝突。隨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這項挑戰會愈來愈嚴峻。北京特別關注政治制度不同所造成的利益分歧，它了解西方國家對中國懷有戒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威權型政體。「和諧世界觀」強調不同的文化與制度和諧共處，否定「文明衝突論」。

中國領導層接受強權政治依然存在，而國際關係民主化目前只是一個理想。他們希望推動對話、交流與和諧共處作為國際關係的主流；北京顯然認為它的立場能贏得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因為後者抗拒美國的單邊主義以及西方國家要求它們接受西方的政制模式。

不過，上述的外交政策路線有其局限。「和諧世界觀」與馬列主義沒有甚麼共通點；而當中國領導層大力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時，國內的民主化則未見任何進展。西方的理論界仍然相信民主國家不會彼此交戰^⑤；而中國的長期政治、社會穩定最終有賴民主與法治。

以聯合國為例，中國就其民主化未有提出具體的方案，它依然維護本身在安全理事會的否決權，亦沒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道積極尋求共識推動聯合國的決策民主化。

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亦受制於國際媒體主要為西方國家掌控這一現實。1990年代，中國學界大肆批判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但西方社會基本上聽不到他們的聲音。近年西方媒體對中國的非洲政策有不少批評，但中國學者和官方的智庫同樣沒有反駁的地盤。

現階段中國領導人自言繼續努力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致力中國的現代化，因而中國必須避免與美國和其他大國的衝突。隨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這項挑戰會愈來愈嚴峻。

總體而言，中國努力建立滿足現狀、銳意維持和平國際環境的形象，亦贏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長遠打算，仍有相當戒心，特別是未來中國國力臻於強盛的階段。

近年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有可能促使中國當局就若干問題採取強硬的立場，有違推動「和諧世界觀」的形象。2008年11月，薩爾科齊 (Nicolas Sarkozy) 以法國總統和歐盟輪值主席的身份接見達賴喇嘛，中國政府遂推遲溫家寶總理赴法出席中歐領導人會晤。2008年12月和2009年3月，中國海軍巡邏艦艇高姿態地巡弋釣魚列島和西沙群島的專有經濟區海域。這種行動對中國追求和平的形象有反效果，亦招致中國國內遇到困難在外交上就會轉趨強硬的猜測。

總體而言，中國努力建立滿足現狀、銳意維持和平國際環境的形象，亦贏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長遠打算，仍有相當戒心，特別是未來中國國力臻於強盛的階段。

註釋

- ① 〈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上的報告〉(2007年10月24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
- ② 參見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 eds.,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2), 1-19。
- ③ 參見《大國崛起》系列叢書編輯出版委員會編：《大國崛起》，共八冊(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 ④ 參見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 ⑤ 參見Stephen Blank, "Which Way for Sino-Russian Relations?", *Orbis* 42, no. 3 (1998): 345-60。
- ⑥ 參見《人民日報》，1998年8月29日。
- ⑦ 就中國外交部關於「新安全觀」的闡釋，參見〈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2002年7月31日)，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08/06/content_512599.htm。
- ⑧ 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no. 3 (1993): 22-49。
- ⑨ 參見Joshua C.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11-13。
- ⑩ 參見John Williamson,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ed. John Williams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8-19。
- ⑪ 參見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⑫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援助司：〈中國對外援助基本情況〉(2008年1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http://yws.mofcom.gov.cn/aarticle/m/200801/20080105361773.html>。
- ⑬ 參見Edward Friedman, "How Economic Superpower China Could Transform Afric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4, no. 1 (2009): 1-20。
- ⑭ 參見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 ⑮ 參見Spencer R. Weart, *Never at War: Why Democracies Will Not Fight One Anoth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